

序

利他主義的跨宗教對話和跨學科研究，是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攻讀博士學位時，在導師賴品超教授的建議下確立的選題。彼時，世界尚未像當今一樣充滿紛爭，利他主義的研究更像是在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上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現時，面對許多新的不確定性，人類從利己走向利他社會的美好願景似乎也受到了挑戰與質疑。當然，這也使利他主義的研究變得更為迫切，並且具有了更多經世致用之義。

促進利他主義的研究，一方面在於跨學科的探索，另一方面在於跨文化的交流。筆者自己是出身於清華大學哲學系，然而「利他」卻是一個涉及生物學、心理學、行為學乃至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概念。如果說筆者在北京是獲得了規範的學術訓練和必備的專業知識，那麼在香港則主要是開拓了眼界，接觸到了科學與宗教等跨學科對話的前沿動態，而基督教與現代演化生物學關於利他主義的對話正是其中之一。當然，利他本身也是哲學關心的問題，比如相關的同情概念。然而，根據筆者的體會，哲學的判斷多是依賴哲學家自身的觀察與洞見，這些洞見並非沒有道理，而是皆可言之成理。哲學所缺失的，可能正是科學的形而下基礎。如果不想使哲學探究成為空中樓閣或邏輯遊戲，那麼在輕易地批判科學主義的還原論之前，借鑒與吸納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或許會是更有成效的途徑。

「利他」不僅是不同學科試圖解釋的現象，也是不同文化共同關心的價值。或許是出於哲學追求本質與普遍性的秉性，筆者在偶

有進行的跨文化審視中，往往容易對相關比較對象做出定型化的論述，而據筆者的觀察，學界的比較研究與對話也大多如此。然而，至少在進行宗教比較與對話時，筆者對賴品超的判斷深以為然，亦即個別宗教內的分歧甚至有可能超過不同宗教間的差異。如果能夠避免對個別宗教做出大而不當的概說，而能注意到宗教傳統內部的多元性，那麼看似對立的不同宗教，也有對話甚或融合的可能。事實上，正是這樣一條簡單的原則，便使筆者直接打破了以往習慣的思維模式，同時讓筆者所從事的宗教學術研究之路也變得豁然開朗。關於利他主義，乃至關於其他任何人類共同關心的議題，跨文化交流都理應提出更具建設性的意見。

雖然仍然有許多缺陷與未盡之處，但是筆者關於利他主義的研究可能會就此暫告一段落。本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筆者在清華大學的導師田薇教授和朱東華教授。雖然筆者的研究方向有所轉變，但是兩位導師謙遜的為人品格、踏實的學術態度和友善的交流風格，仍然是支持筆者在不免為外力裹挾的工作中繼續潛心學術研究的動力。其次，筆者還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導師賴品超教授和學愚教授。賴品超教授寬廣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深厚的學術功底，始終是筆者難以企及的。此外，對於從未系統學習過佛學的筆者來說，學愚教授深入淺出的講解和提綱挈領的指點，也使筆者對佛教不斷有所領悟。時至今日，與兩位導師交流碰撞出的火花，仍然是筆者學術探索的靈感源泉。最後，筆者還要感謝北京大學的張志剛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趙廣明研究員，如果不是他們對本著作出版的關心與督促，那麼書稿的修訂與交付恐怕還要拖延時日。此外，清華大學的王曉朝教授、黃裕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黎志添教授、譚偉倫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鄭筱筠所長、唐曉峰副所長和宗教學理論研究室的諸位同事，皆曾對筆者的研究工作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持。能夠在求學的不同階段遇上學高身正的導師，並且在清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這兩所亞洲最美的校園度過黃金十年的求學時光，實乃人生最大的幸事。

在書稿付梓之際，筆者要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世界宗教研究所不僅提供了優良的科研平臺和學術資源，而且增進了筆者對於中國國情的全面瞭

解，使得筆者不僅能夠潛心學術研究，而且能夠學以致用，為國家服務。此外，筆者還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提供本次寶貴的出版機會，尤其是中心副研究員莫介文博士對於本書編輯與出版的幫助，在香港友人的身上，最好地體現出了利他主義精神。最後，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業務部助理經理甄挺良先生對本書出版之肯定和支持，以及其團隊的用心製作，使本書得以順利面世。當然，關於利他主義的研究，實際仍然是一份未竟的事業。雖然筆者已經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鑒於知識背景和時間有限，在每一個利他主義相關學科和宗教的論述中都必然存在錯漏和不足之處。如果有讀者發現了其中的常識性錯誤，還望見諒以及不吝賜教。如果讀者還能從本書中獲得任何啟發，乃至從自己的文化或學科背景入手關注和討論利他主義，甚至參與在跨宗教和跨學科的討論之中，那麼本書的目的也便達成了。